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如是」文學雜誌的美學現代性與文化策略(II-I)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1-2411-H-032-005-

執行期間：91年08月01日至92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蔡淑玲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2 年 10 月 29 日

文學批評的現代性

從克莉絲蒂娃與中國語文的關聯談起

蔡淑玲

摘 要

相對十八世紀以來的啟蒙精神，六十年代的作家批評家思索文學的現代性時，將語言視為批判理性傳統的主要對象，企圖破除啟蒙哲人結合了理性、自然邏輯(l'ordre naturel)與法語深層結構的清晰條理所建構的語言民族主義 將法語帝國化、普世化成世界語言的野心。語言學關鍵性的參與改變了文學中意義的生產模式，從索緒爾(F. de Saussure)以降乃至班凡尼斯特(E. Benveniste)，文字語言不再是透明的意義載體反映深層理性結構的次序，而是製造生產意義的材質；不再將語言看作純粹的符號結構，而從語言和意識形態檢視說話主體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結構元素成為檢驗文本開放性(而非作品完整性)的依據，反對將文學視為完整的作品分析簡化的條規。本文將整理克莉絲蒂娃(J. Kristeva)文學批評的現代性觀點及主張，其中聚焦於語言之為意義生產材質的論述及其背景，並以此焦點切入當時中文造字提供的靈感。中文邏輯在克莉絲蒂娃的解讀下到底如何協助開發了法國知識界在七十年代對現代性提出的觀點和闡釋?在我們移植西方現代精神、形式、技巧的過程裡，是否在根據本土現實環境與思維模式的限制下進行的詮釋與形變中(如現代主義文學的定義搜索)，漏接了西方(如法國)語言文字「混異」的思索關鍵?關鍵在於吸收現代科技與生活型態時，固有的象徵系統接受挑戰甚至修改的過程中如何同時發揮比較篩檢的功用?所謂後結構以至於後現代的思潮移植到台灣後，值得深思的是:我們藉以辯證現代性的參考質數---所謂傳統或固有的象徵意義系統(中文思考模式與台灣特殊時空交相形成的主體)到底如何運作?

關鍵字：克莉絲蒂娃、現代性、如是文學雜誌、互文理論、中國語文、現代主義、主體性

法國語言學者馬日尼克(Henri Meschonnic)在《現代性現代性》(*Modernité modernité*, 1988)一書中歸納了波特萊爾書寫中「現代」(moderne)一字的四大用法：首先，「現代」在繪畫評論上指的是當代(contemporain)，而那時當代即是浪漫(romantique, romantisme 浪漫主義)。之後，主題選材以城市生活、巴黎居民、社會階層之三教九流為內容，在流動與變異的存在細節裡萃餽詩質美感，是為「現代」之美 (Salon de 1846)。然而當「現代」從時間的軸線上等同於科技的進步 (progrès)時，歌頌城市現代美的波特萊爾卻是語帶貶意的，他強烈反對混淆物質與精神的次序，拒絕將進步的觀念施於創作上，指責布爾喬亞制式 他口中「法式」的藝術觀點 (Salon de 1855)。到了 1859 年，法式即現代的用法完全反映了負面的意義，從中詩人重新尋覓創作的定位說：藝術家、詩人最終呈現的不過是他自己——在社會眾生裡既是主體亦是客體的自己。馬日尼克註說：現代詩人開啟了主體的理論 (théorie du sujet 110)。

「現代性」(modernité)與「現代」(moderne) 並非單純互應的名詞與形容詞。「現代性」更複雜地指涉著「現代」一字的變異。七十年代克莉絲蒂娃發展主體論述時再提現代性，上承波特萊爾，後蒙精神分析與結構語言學的粹鍊啟發後，文學之現代不僅是主體自身 主體性形成過程裡異質未知的困惑與知感經驗的極限探索，更是主體與書寫行為、主體與社會規範、主體和語言表達、語言和其他藝術形式互文的多層次關連。所謂的現代主體無論質形都產生了極大的變異。六十年代主體雖被「結構」分解取代，但並未完全消亡，在結構的框架下，隨著每一個主詞「我」(je)，在一次次說話聲明的當下——出現/消失的反覆過程裡若隱若現。「我」，是生生不息的意符，承擔著限制，並在限制裡創造——這是我們更貼近、卻也更無可捉摸的現代性。但這，和中國語文有什麼關聯？對一個以中文為母語閱讀接收法國思潮者如「我」，這樣的關聯有什麼意義？

I. 中文的啟發與語言的物質性

克莉絲蒂娃於 2000 年修訂重新出版《中國婦女》(*Des Chinoises* ; ed. Pauvert 2002 ; *Des Femmes* 1974 初版)。序言 如是中國 (“*La Chine Telle Quelle*”)裡提到 1974 年與梭萊思(Philippe Sollers)、巴特(Roland Barthes)、皮列奈(Marcelin Pleynet)、瓦爾(François Wahl)等組團訪問中國(拉崗 Jacques Lacan 因事無法成行)，可說是西方學界深入中國的第一團。克莉絲蒂娃因出版社補助一萬法郎，將女性議題列為訪識的焦點。之後寫成《中國婦女》一書，但也因此一行程與書籍的出版使她自此放棄了成為漢學家的志願，並和女性主義等政治主張漸行漸遠。放棄成為漢學家是因為：雖然擁有中文學士基礎，但自覺無法充分了解並詮釋中國文化深奧的精萃，又不願不可避免地重踏所謂東方主義殖民觀點的西方漢學窠臼。離開女性主義的政治氛圍，則是當年出版社威脅要她放棄父姓、夫姓，冠上女總編的姓氏，並罔顧作者校稿權益，逕行付梓。至於和其他在六八年後狂

熱相信共產黨的西方知識份子不同之處則是：

身為保加利亞的放逐者，我自認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因此不像西方布爾喬亞年輕人一般受惑於中國的共產主義。在精神分析與人類學之間，令我驚異的是人性的多樣性，促使我去發現：如果宇宙以陰陽為說，以象形為文字，那麼這個世界上將會如何展現另一種權力的模式？尤其是所謂社會主義的權力。

(Kristeva 2000 : 8-9)

回國後立刻發表的短文(“*Les chinoises à contre-courant*”,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No. 592, août, 1974)裡，提到中西最大的差異是：中文象徵系統在實踐中完成，而非客觀獨立存在（如字母文字以文法句型抽象規範）；沒有聯結唯一真神真理聲音的動詞觀念（“Verbe”）。男人和女人的身體之間無所謂差異阻隔，而在經濟象徵系統裡互相應和中相互成就。亦無所謂踰越，追求法外的慾望客體，而以母親為中心，環繞一微型的孩童社群(une micro-société enfantine)，圓轉形成生產體系。而西方以神性、父權、動詞為中心的意義生產模式則將母親的功用定位在孩童進入象徵社會的中間媒介，以受洗為職責帶領小孩進入社會社群結構(復歸於一)。

當然此一社會型態的比較在現代中國或台灣均不再適用。但我們在此的興趣針對的是克莉絲蒂娃所提相應於中文系統可能產生的思考與文化模式，並探究中文之為異質文化如何啟發影響克莉絲蒂娃對現代性的思索，專注於意義生產模式與思考邏輯的改變。克莉絲蒂娃語重心長地說：「中國婦女的問題我們無法解決，同樣地不能期待中國在封建與孔子儒學裡提供我們解決困陷在一神教與資本主義裡的困境。」(528)二十五年後再版，克莉絲蒂娃寫道：若是重寫《中國婦女》，將會更深入探討所謂資本一神主義(monothéisme capitaliste)發展而出的兩性關係結構，再進行描述融合了道家與孔子儒學的中國文化裡中國女人的面貌。(11)克莉絲蒂娃認為西方女性權益的發展的確程度上改變了社會律法的平等，但是對兩性相處的問題模式卻無內涵上真正的精進。克莉絲蒂娃最終並不放棄觀察中國女性在當今經濟發展與全球化趨勢下所能扮演的角色，並指出使中國女人具備提供迥然於西方觀點的兩性模式之優勢，端看她們如何從母語中擷取思考邏輯的精粹，適之以現代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變化。序言裡最發人深省的是這段話：「全球化有待重估：男人/女人，精神/肉體，聲音/手勢，口語/書寫在各個文化裡劃分模式迥異，而中國人的思想更蘊含另類思考慾望、意義與政治的潛力。」(13)

八十年代克莉絲蒂娃將「從傳統中擷取思考邏輯」落實在西方「母親」的重寫，在宗教論述上以聖母瑪麗亞為象徵，轉換了中間媒介的意義，以精神分析理論為輔，提出象徵系統裡既可成就父權次序亦可顛覆繼承意義、啟動驅力的中界概念(chora ; entre-deux)，將西方靈肉辯證終歸於一的對立邏輯轉化為相生相剋如陰陽的永恆運動，將意義的生產落實在互動的實踐裡，從而提出新的主體建構與

意義生產模式。黑格爾框架下靈肉辯證的過程在克莉絲蒂娃改寫下更偏重肉體物質對社會主體型構的影響。以母體女人為象徵的物質肉體不經意地回反侵擾父權的象徵次序，兩者之間的互動，從現象學傳統而言，既是意義的阻斷或說認知主體本身的目盲、意識的中斷，因而回神體認異質他者的存在。

克莉絲蒂娃認為，那主體本身原不是一個完整連貫的意義生產者，而是語言物質在特定時空下流轉成型的結果。源自母體肉身的記憶則如地下因果，無時無刻不威脅著翻覆社會象徵界排除物質肉體而成就的秩序。在否定動能或說死亡驅力的演繹下，主體與型塑主體的社會之間形成抵抗/內化同時進行的張力，主體既要壓抑轉化肉體物質以期進入象徵系統卻又無可避免產生抵觸排斥現象，其間造成異化相對於完整一貫的意義系統將導至語言的混亂或樂觀地說：語言修辭的活化創造。將佛洛伊德生死驅力視為不斷拉距的矛盾掙扎，克莉絲蒂娃將主體內在的異化聯結外在社會法規的壓制與經濟生產模式造成的外在異化，改寫黑格爾異同辯證合一的意識經驗，在驅力受制的反斥上關注異同辯證的邏輯，探討異質侵擾的意義生產模式如何影響改變知識、科學、宗教等意識層面的語言邏輯，進而活化語言模式、思想價值，達到詩語言之改革(*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1978)。

克莉絲蒂娃回歸物質世界(母體身體)重塑認知主體(社會象徵)，也因而為兩性關係另闢蹊徑。從中多少可以追溯之前中國語言文字思考模式的省思。克莉絲蒂娃引介中國文字語言的運作方式，在批評西方語音象徵系統時強調「中文裡，西方一向認為正統的指涉-意指/意符(signifié/signifiant)關係被改變了，之間的分界不再明顯，更沒有優劣級等之別。意義、聲音、實物融合為一字形表現，一如戲劇空間裡各司其政又相互對應合作的演員」。(Kristeva 1969:77-83)據克莉絲蒂娃的分析，中文運作的方式與西方字母語言不同，沒有西方符號將物質抽象化象徵化的思想背景，「西方人若要更確切地了解就要把所謂符號-意符/意指(signe/signifiant/signifié) 的概念轉變成指派(暫譯)« dé-signation »，指派者« dé-signateur »及被指派者« dé-signaté »。中國象形文字並非物的命名(nommer)，而是指派的指派 意即指派的姿態。(79)

研讀六書造字的邏輯後，擁有中文學士基礎的克莉絲蒂娃認為：中文以切割重組的造字方式，若以現代語言學而論，沒有一個字的意義是固定的，必須在句型中視上下文而定。(77)援引法國學者葛內之研究(*La pensée chinoise*, 1934)寫道：中國字和西方符號的觀念有根本的差異，西方強調一個字指涉的抽象觀念必須精確到猶如本質放諸四海皆準；象形字則在一組特殊卻不明確的形象組合中突顯意義，總要靠句型文法等上下文關係而定。(74)克莉絲蒂娃指出：中文乃世上唯一沒有被語音抽象化的文字，其特殊性避免了語文過度抽象的表現。在字與物的關係中，中國文字仍緊緊於物(不會在觀念的抽象過程中，藉概念抽離而成意符)，而不失之於物，而是將之轉化到另一組空間系統中。於是象徵與真實融合

為一 (而不致造成符號系統抽象化中產生的空缺匱乏)。¹

(漢字固然可以套用理論純粹被視為符號，分別意符/意指，問題是：當西方慎而重之在語言裡解構源於神聖真理的意指，漢字訓估追溯的終極意義是否相同？如此分辨東西之別是否必然導致意義生產模式的差異？在比較交流上無可避免地產生變異與誤解？然而變異與誤解難道不也成就另一種溝通的有效性？或者，必須重估的其實正是我們對溝通有效性的期待？如果西方的「我」業已變異為生生不息的意符，溝通於東於西是否都意味著另類形式內涵？)

回到克莉絲蒂娃的論述，在此我們必須提及她從語言學者班凡尼斯特的理論裡汲取的養分。在論文《說話主體與謂語功用》(La fonction prédicative et le sujet parlant)一文裡，克莉絲蒂娃引述班凡尼斯特，不再將語言看作純粹的符號結構，認為語言實體必在實踐中觀察結構，牽涉的是多樣異質的物質：除了語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主體和意識形態的涉入。班凡尼斯特從謂語的功用檢視普世語言中說話主體與外在物質世界的互動關係，認為謂語不僅在說明一個主語，而在藉由論斷聯繫的聲明(énonciation)中，同時點出說話主體和外在指涉對象的相對位置，界定說話主體在社會象徵系統中與他人溝通時意義的連貫與指涉，提供了社會溝通系統中的結構範疇/限制。班凡尼斯特重要的貢獻是提出此一結構作用必涵帶解構的辨證，在黑格爾的現象主體哲學中加入了前所未有的面向：在顯性的判斷與聯繫作用外(prédiction assertive et cohésive)，強調了謂語的隱性作用。符號系統中意義組成過程的無限與變異(prédiction altérante et infinitisante)。後者在詩語言中得以外現，暗示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裡死亡驅力的溝通阻斷。

舉例而言，當說話主體將不確定感表現在謂語中造成術語及賓語的紊亂，往往造成句型的變異與意義的混淆晦澀。句型變異是具有現代質地的作家常用的語言病癥。²從語言的角度審視文學的現代性，作家之為主體並不先於文本存在，

¹旅日學者連清吉在《中國語文與中國人的思想特質》一文裡如是解說：根據許慎《說文解字》序說：描寫事物形體的稱為「初文」，就六書而言即象形與指事；組合初文，增益音韻而滋生「字」，如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就數量而言，象形為指事的六倍，可說是中國文字的原型；而以初文為本組織再造的字中，則以形聲字為最多。這裡的重點是：無論以聲符或意符組合借用再生以創造新字，中文系統的確是以象形為既有的典型並以此典型為本衍生孳乳。從而可見中國人思維的基本特質：重現實的理性思想，但也同時在文字創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邏輯中發展出天地、日月、陰陽、上下、左右等相對思維。(66)

² 克莉絲蒂娃以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的 *The Sound and the Fury* (1931) 為例：“I had forgotten the glass, but I could hands can see cooling fingers invisible swan-throat where less than Moses rod the glass touch tentative not to drumming lean cool throat drumming cooling the metal the glass full overfull cooling the glass the fingers flushing sleeps leaving the taste of dampened sleep in the long silence of the throat I returned up the corridor, waking the lost feet in the whispering battalions in the silence to the gasoline, the wath telling its furious lie on the dark table.” 整段以不確

而是在特定文本情境中因聲明而存在，亦僅只存在聲明中。讀者透過主謂語顯性與隱性作用的更迭變換，尋找說話者(如小說中敘述者)的聲音和視角，往往發現無法連結一個理性先驗的主體，反而出現曖昧紛雜，感官與象徵系統的失序現象與企圖尋找新聯結的嘗試。此一文學空間於是跨出純語言與上下文情境的指涉範疇(trans-linguistique et trans-contextuel)，改變了以西方哲學傳統存有、本質與概念(Être, Essence, Concept)的階級體系。文中克莉絲蒂娃曾以中文為例說明班理論中的謂語作用，認為中文的謂語和主語之間不像西方語言那樣斬釘截鐵地分別開來，真實與象徵因而從不涇渭分明。由於牽涉語言學專業，有待另行深入研究，不敢妄言論斷。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克莉絲蒂娃細數西方終極意義的神聖概念如何從西方宗教哲學傳統至黑格爾現象學之後逐次修正語言的指涉系統，顯然西方宗教哲學和說話主體及其語言指涉之間的關係和中文系統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差異。在此重點仍回歸本文主題，從克莉絲蒂娃分析中國與中文的異質性看她如何從中截取修正西方理性論述的脈絡，語言和說話主體的意義生成模式如何佔據現代性思索的重要位置。對以中文為母語的我而言，認知中文的說話主體和外在物質世界的關聯似乎是思索現代性議題時十分關鍵的環節。³

《如是》雜誌(*Tel Quel*)在六十年代受馬克思、恩格爾影響提倡的文學改革運動中，將靜態凝現(*la représen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的文學觀念鬆動成書寫文本的動態實踐(*la pratique de l'écriture*)，並從語言的質變切入現代性(*la modernité*)，重新詮釋現代文學如卡夫卡、普魯斯特、喬艾斯、馬拉美、羅特亞蒙等文字書寫的現代質地。所謂意識流、時空交錯、形式技巧、象徵手法等乃是外現的徵兆(*les symptômes*)，造成現代與先前十九世紀才真正成型的文學迷思(*le mythe de la littéralité*)之斷裂的因素，是語言指涉功能和擬現作用的崩潰瓦解：文字不再侷限為表達或傳遞意義，而是裁用的物質或素材，書寫本身成為目的，其審美層次更接近形象表演藝術如戲劇、舞蹈或書法。亦即語言和現實感官的聯繫邏輯產生了根本的變化，與其說模擬不如說形變，就語言本身的結構組織來進行意義元素的選擇(*la sélection*)和整合(*la combinaison*)，結合結構語言學建立在元素的整編縮合的形變概念上，思考西方以音節、文法、句型順序排列的語言邏輯而產生變異，其中異質原素的發酵作用不少來自埃及與中國象形文字的探索。西方文學轉型為書寫，在語言的反省中，曾深受中國象形文字的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造字方式的啟發(意義元素的選擇編排與縮合)。梭萊思(*Philippe Sollers*)便聲稱現代書寫不再以傳統意象為經營對象，而是一種類似中國象形文字

定的主詞起首，開始沒有標點的怪異句型(*I could [or]hands can*)；再以回神的「I」恢復正常的句法。(*Langue, discours, société pour Emile Benveniste*, 255)

³ 大陸學者刁宴斌在《初期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紅葉, 1998)一書中從社會生活對語言發展變化的角度研究五四運動至三、四十年代中文新生語法現象，對文言古文至白話文的變化中主謂語法的變異有相當多例句。

形變的概念，一種象形與聲韻的結合(Sollers 1966)⁴。

⁴ 早在 1963 年，梭萊思與其他《如是》雜誌成員對毛主義便十分狂熱，之後更積極介入左派政治活動。當時，毛主義、馬克思、拉崗與德希達可以說是法國左派知識界理論的基本架構。所謂後結構(post-structuralists : Derrida, Barthes, Kristeva, Foucault, Lacan, Denis Roche, Maurice Roche, and Marcelin Pleynet)主義者群集於極受爭議但影響至鉅的文學雜誌《如是》旗下，一如大衛海曼(David Hayman)在梭萊思所著《書寫與極限的經驗》一書之英譯本序言裡說：「《如是》進出法國共產黨可說是當時知識界風尚的領導者。」《文學雜誌》(*Magazine littéraire*, no 65, 1972)一期即反應當時知識界對《如是》又敬又怕的評價：「只要聽到梭萊思這個名或他那文學雜誌《如是》，就叫人牙齒打顫。晦澀難懂、知識界的恐怖主義等當年加在超現實主義身上的責難不一而足。」從六十年代支持新小說的文學主張、七十年代對共產主義的狂，《如是》引起的負面評價可說比正面要多得多。〈屋頂〉，菲力普梭萊思於一九六七年寫成的論文，標示了《如是》雜誌創於一九六〇從政治介入轉向文化倫理關懷的轉折。此一轉折在《如是》提倡的文化現代性構思中極為重要，標題〈屋頂〉勾勒出的意象即可說明《如是》所謂現代化落實在文學文化上的思想邏輯：一種聯結兩造拉距勢力的中界空間，一道論據的極限，促成黑格爾主人與奴隸永恆的辯證。梭萊思寫道：

我們要往一個方向行進，接近廟宇的屋頂(le toit)，在其上睜開雙眼，無所畏懼，看見各種可能的對立之間的關係。這個屋頂並非布烈東所謂的理想之點，所謂諧和生命與死亡的精神高點，使對立不再矛盾。我所謂的高點，不是指精神的或是觀點的，而是更物質地說：一種空間的關係、網路的匯聚點。我們與布烈東兩者之間說法的相異處十分關鍵，從中可知為什麼巴岱儀和布烈東對黑格爾的看法意見相左。其實問題不是從屋頂上可以看到什麼，而是這個屋頂到底是什麼？連帶要問的是：為什麼基本上大家連想都沒想到去思考有這麼一個屋頂存在著？

此一中界空間挑戰所有論據的極限，兩者之間的概念使得二元辯證無法獲得調和統一，導致語言中傳達信息的符號觀念-意符/意指二分後再結合指涉的功用瓦解，造成巴岱儀所謂語言的消亡，徹底挑戰人本主義的世界觀與思想模式。

在〈屋頂〉一文裡，梭萊思對共產黨的憧憬仍殷。然而透過對巴岱儀思想的闡釋，針對跨越一詞所提的解釋已經預見了七十年代後《如是》與共產主義的決裂，追隨超現實與前衛藝術的腳步，梭萊思本欲動搖體制，但同時卻明白點出自己和布烈東藉由否定力量調節矛盾的路線有所區別。簡言之，《如是》所謂的現代性並非一系列可供指證的特點，而是一種思維模式：將黑格爾的辯證矛盾從最終的調和統一解放出來，與宗教神學賴以建基的本質/表象、神隱/再現所涵帶的優劣之別相對，形成永恆的張力與拉距。兩造勢力不以對立為互動模式，而在相生相剋中互斥互立，從而衍生的文學文化議題如：完整意義結構裡的異質雜音、社會主流律法排擠的邊緣弱勢等問題，若不以對立消長的邏輯思考，其間的關係將可開放出多少其他意義生產消費的可能性？所謂二元的物質辯證即〈屋頂〉一文重點所在。肉體、動物性、死亡、暴力、性愛等被西方主流思想界象徵再現系統排除或淨化的物質如何回覆侵擾歷史？如何在科學哲學論述之極限-亦即語言、再現象徵系統的極限之外看見神話與神秘的原始？《如是》梭萊思

中文組合結構句型的特性及物質性在在提供了《如是》雜誌構思文化現代性的靈感。筆者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啟發即是：將西方語言從神聖的指涉與神學的框架裡釋放出來。書寫(écriture)成為政治權力運作場域中互動成型的結構，在中文意義製造模式中來理解《如是》提出的書寫概念，語言不再是再現，而是指派權力姿態的場域、實物的終極意義在書寫的踰越過程裡，可說與不可說之間，不斷被推移置換⁵。一如梭萊思所說：「說明某事物」就是將自己放置在與此事物同在的空間裡，使得說明和事物兩者並非互相抵消，而是相伴共存 (110)。踰越的書寫因而是原始自然與神聖並存的世界，從而衍生意符的換置遊戲 (113)，成為論述極限的經驗。其中，靜默混同聲音，在語音系統與象形排組中隱約看見指派的姿勢、書寫者的肉體。

所謂的現代性：

如果想把語言從這樣的困境拯救出來，就必須認知暴力（動物性）之為人性本質，原則上是被消音的，因整個人性都可說在沉寂中說謊，也就是說語言本身就建立在謊言之上這個說法樹立了新的里程碑。里程碑，因為對意識提出了嶄新的定義、解讀所有官方歷史文本，更進一步發現被排除抹滅的、審檢消音的，以及被抹黑的。里程碑，因為呈現了所謂「實証」的論述和被其排除丟棄的部份之間的關聯。那被丟棄到別處的，因而更見強調，甚至根本被重覆張顯。最後稱之為里程碑，是因為讓我們看見了「人性」必然引發自身「非人性」的辯証關係。

根據梭萊思的說法，此一永恆二元的思維模式從中國陰陽運行的說法得到極大啟發：可以說這就是喬治·巴岱儀的「二元物質論」：不期待由最後的認同與一統來調合矛盾對立，而是一開始就分立兩個對等的原則，「二」不從「一」分裂而來，而是先於一就存在。德尼何列指出此一二元論「並不是在一個世界裡分出二個原則，而是根本就分成兩個世界」，並說「二元思想就是在這種二元性的開展中。即所謂的二者之間，側身立足運作張力」。此一無從確立立場，甚至可說必然是「謬誤」的，只因位處兩極同樣「真確」的想法之間...唯一聽來接近這種對我們而言深奧難懂卻仍可理解的思維模式就是中國思想：陰與陽一開始就是二元的，而道則完全沒有一統的概念，更沒有神的意味，應該說是矛盾生成之「處」。

《如是》雜誌創辦者梭萊思在毛主義的革命狂潮中找到思想的應和，對中國哲學的熱愛不已是因為在其中找到修正黑格爾的靈感。在上述二元物質辯證的框架下，克莉絲蒂娃於七十年代加入編輯職務後，亦在其論述中將思考重點放在反襯思考(antithèses)的意義生產模式上，認為批判律法標準時，必須先考慮每個特殊文化語言系統中分割意義的權力視界。

⁵ 《漢字文化學》(何九盈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一書中，何九盈指出：從對字型誤解，可看出意識形態、政治意圖、神話思維、迷信思想、古代習俗、陰陽五行等交錯混合的思想體系。舉例：武，被認為是「止戈」，由春秋五霸楚莊王提出為的是顯示武德。許慎《說文解字》一舉為正解，直到甲古文出土，方改變原有解釋：「止乃四之曰，舉趾之趾，足也，行動之意。」(P.219)

II. 類中文的互文邏輯與文學批評的現代性

當然，克莉絲蒂娃的學說並非毫無值得商榷之處。中國大陸學者羅婷引述 Kelly Oliver 說：中國在克莉絲蒂娃筆下被浪漫化了，被製造成符號學、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化與獨特血脈中慾望的客體。將中國文化大革命與婦女解放等同一致的看法，簡化了中國社會父權與婦女的關係。而將中國語言與母權制文化和前伊底帕斯話語，把個體心理與語言習得混同，無疑是把中國語言屈從於其記號學理論，並以這理論作為評判中國文學作品的標準(羅 178)。羅婷進一步指出史碧娃克(Spivack)、周蕾等人的批評，認為克莉絲蒂娃將中國刻化為具有獨特邏輯的他者，視之為女性的、神秘主義的、非理性的看法與早期的東方主義做法並無差別 (205-206)，卻也同時承認：克莉絲蒂娃比史碧娃克更關注中國婦女，也更了解中國婦女，也以更平和的心態看待中國(208)。

筆者認為羅婷的評斷不失公允，也贊成她的說法，認為《中國婦女》並不是一本完全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書，而是克莉絲蒂娃藉以參照對西方進行批判的理論依據。(羅 178 ; Dübel)然而筆者認為：克莉絲蒂娃原不欲準確無誤地呈現或解讀中國，而是將「他者」視為西方論述的限制。如前所述，梭萊思與克莉絲蒂娃最終仍回歸到黑格爾二元，企圖修正的是西方觀念下的理性傳統，對中國文化與中文的研究與興趣停留在去脈絡化的文字與思想之抽象邏輯。克莉絲蒂娃並不以東方漢學者自居，《恐怖的力量》中文版序再度強調：「我以曾在大學時期研讀中文自豪，同時卻深知面對此一浩瀚宇宙，這是何等不足，讓我得以衡量橫互在西方猶太一神的基督、印歐信仰內的神聖界與中國傳統之內，本身極具有高度、複雜性的神聖領域之間的距離。」(iii) 誤讀與否，克莉絲蒂娃提出的角度值得參考之處是：當我們接近他者異質的時候，受制於生存的歷史文化宗教背景，不可避免地會以本位出發，任何一個社會主體都必須面對自己的限制，對他者抱持探問的可能性，永遠懷疑自己的理解與溝通的有效性。結合美學(esthétique)與道德(éthique)的啟示，對知識客體或溝通對象，不抱持絕對的詮釋，最多環繞其週邊探試出多重反覆的途徑以期接近，更何況那所謂他者，其實可能就是為形成自身必須排除後卻又必然反斥的異質。

重新認識中文，也許如克莉絲蒂娃在《自身的陌生人》(*Etrangers à nous-mêmes*)裡所說的，是一壓抑的覆返——熟悉的陌生，被排斥遺忘的母體在意義瀕臨危機的時刻回返，搖晃原本習以為常的文字符號性，導致象徵系統的動搖，而產生文字符號的物質元素與感官精神心理狀態重新連結：「一首詩」或「一手失」而成「一屍首」，符號在剎那暫停抽象的象徵作用，從「說」(dire)退渡「做」(faire)的功用，而在意象或影像上成就創造心理的物質現實(Kristeva 1988:275)，亦即 genotexte 對 phenotexte 的重寫。

從這個角度審視，筆者並不認為克莉絲蒂娃完全將中文定為位於前伊底帕斯的異質，反而是在中文造字邏輯上印證其唯物語言觀以助發展其現代性理論。國

內學者主要聚焦於克莉絲蒂娃和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理論的關聯。⁶在此提及中文邏輯的影響時，讓我們再回到克莉絲蒂娃七十年代所發展的正文理論。于治中在解釋克莉絲蒂娃的解析符號學時清楚地指出，經由對符號異質的認識，克莉絲蒂娃之解析符號學有別於以溝通意義為導向的傳統符號學，視文學作品為符表的實踐，經驗形成主體的場域。其中說話主體既認同所處的社會體制組成符號系統 (la constitution) 亦同時表現了穿越 (la traversée) 與偏離，使得正文具有不斷運作的生產能力。(呂 213-225)

援引巴赫汀的理論，克莉絲蒂娃分析中世紀第一本小說文本闡釋互文性概念時，提出敘述者說話的現在時態(「回到我的觀點」，「誠如我所說的」)經常中斷故事本身線性的發展順序。當敘述者又同時是故事的主角(如自傳體文本)，產生角色時空雙重甚至多重複疊的效果，敘述者陳述故事的過程若再加上引述(「就像維吉爾說的」，「針對這個問題」，「聖徒傑羅姆曾說」)，敘述者同時是演員主角又是讀者也可能成為聽眾的角色轉變，將使得口語文字混雜，情境時空如戲劇換場，進而形成文本連結文本的互文空間。這樣的結構觀念存在於狂歡節、鬧劇、小故事、奇蹟劇中。克莉絲蒂娃認為藝術揭示的是一種特定的時間，凝結於多種多樣表現的生產方式中，把陷入多重複雜關係中的主體織入語言，如自然和文化的關係、意識形態、科學傳統與現實存在以及慾望法則的關係中。一如羅婷所說，這種無限制的羅列和重複的目的不在於接近 [或說再現] 現實，而標誌著語意的模糊化，所有的文本都衍生於此一大文本 [或說大文本形成於文本的互設過程中] 交織成共同的母體 (matrix)。(羅 116-117)

從語言學切入現代性不難了解為何克莉絲蒂娃如此強調過程的實踐。在一篇重要的論文《如何對文學說話?》(Comment parler à la littérature?⁷) 克莉絲蒂娃推崇羅蘭巴特的書寫實踐釐定了當代文學與批評的現代性，帶領搜尋威權體制崩解瓦解之下文學相對於社會與個人的定位與意義，引述巴特說：「一如前衛藝術的經驗，我們不僅要提供一個新種論述或主體的實驗室，更要啟動一整個世代的變動，一如中古黑暗世紀過渡到文藝復興的轉移。」(1977: 23) 這段話點出現代性的題旨：如何對舊世界進行建設性的顛覆 (subversion positive du vieux monde)? 文學既為語言實體? 如何從中內爆主體與社會意識形態之間象徵真實、主體客體的互動關係?

克莉絲蒂娃稱文學為機器 (Machine)，從唯物觀點看待意義生產的機制，循巴特說法，將文學實踐定位在主體與歷史的交叉路口，視主體為意識形態控制下分裂的產物。找出這種種分裂如何被紀錄或掩蓋於文本的象徵系統中，而各式各

⁶ 克莉絲蒂娃在台灣學界經常和伊莉迦蕊、西蘇一起列名為法國女性主義三巨頭，研究成果以博碩士論文收錄的計有：黃逸民，《論陰性：西蘇、伊莉迦蕊、克莉絲蒂娃與巴赫汀的連結》(1988 台灣大學外文系博士)。吳桂枝，《政治與倫理——英美學院派女性主義者對克莉絲蒂娃母性論述的接受研究 1975-1995》(1986 清華大學外文碩士)。

⁷ “*Tel Quel*”, no. 47, 1971, *Polylogue*, p.23-54, Seuil, 1977.

樣的掩藏或紀錄如何變形成紛雜多變的認識客體，是文學批評現代性的重要目標，遠遠超出教條式理論化的單一詮釋與論述之外。簡言之，巴特所謂的書寫，無論是創作或閱讀都將語言視為不斷運動變化的否定驅力(Négativité)，乃是測試象徵語言登錄真實之權限與能力，一種權力視界的界線探索，亦即主體在社會限制下對自身書寫欲望的檢視。象徵系統與感知身體的辯證互動。在象徵系統裡認知被結構化符號化的感知，亦在此一認知過程中體會被排除在結構符號之象徵系統外的莫名元素，差異的間隙裡持續質疑已經成形的意義，探索未成形的經驗，過程將構築起複雜的網路，不斷移動修改連結的路徑。

書寫，因而不是一種特殊的文體或風格，而是看待文學為實踐的態度，以及對這個實踐活動本身的探索與認識(25)，亦即主體在社會象徵裡承受的限制與自由，以自身的困境與祭獻參與締造歷史，在社會象徵的權力視界裡塞進這個社會不敢看、不願聽、不想知道的東西，藉文字客觀物化己身的慾望，在說得出與說不出的交叉點，在若即若離的位置上維持一己與眾人的關連(25)。若說此一文學批評是一種科學，那麼此一科學論述則是永遠向法則開放，探索形成條件的過程。文學將因此進入整個攸關社會與個人的複雜網路，無法單一視角與單一詮釋兩兩配對。一個以科技經濟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社會，為了發展壯大，勢必要排除某些特殊的個人語言以期達到交易溝通的目的。那些被排除的、掩蓋的、拒絕的、禁制的非客體因不被允許成為認知的客體，將形成非地方(non-lieu)文學的非空間，在隱處伏流形成與地上冠冕堂皇的律法相對應的世界，在文明與自然、象徵與真實、文字與肉身、責任與慾望的邊界上建築書寫的世界。

書寫的物質辨證即是克莉絲蒂娃的所言的現代性，從巴特的書寫觀之即是個人在自我與社會衝突間製造意義的可能與表達的限度，一種語言界限的經驗，也因語言的時代性而成為歷史的界限經驗(28)。文學批評的客體對象是一個過程而非成品，是作者與讀者創作閱讀的痕跡軌道，文本與文本交叉縱行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文學的空間因而不是個可以被命名指定的空間，而是物質變證的歷史。文學的真實亦即不可能被如實呈現的終極意義，一個依賴呈現限制的呈現，必須靠語言表達語言無法表達的對象。

因此文學的現代性必然是政治的，但非指必以政治社會議題為內容主題，而是將書寫主體自身視為政治社會律法規範的成品。語言既為型塑此一社會主體的材質，即成為同時允許限制表達的條件[或說場域]。限制的探索衍生新的文學場域，並將途徑帶向一個更錯綜複雜的時空網路，有些顯而易見、有跡可循、有些則陰暗幽微，內化成只有偶然如靈光乍現的脫逸方得回神意識。後者在表達的試驗摸索裡創造異於傳統習性的形式，大致文學上狹義的現代主義作品均具備此等特質。

從一個具體的個人生物社會歷史的存在所產生的意義與表達物質及語言文字之間無法完全密合的間隙出發，視每一個書寫主體為文本，既分裂離散又一貫統一。受制於一種無法抗拒無法預知的驅力(偶然突兀地外現)，此一主體即是巴特書寫閱讀創作中尋找的對象，克莉絲蒂娃則將具有此一傾向的作家視為文學與

批評的現代作家。不以現代主義歸類，而說這些作家文本都展現了現代性的特質；從白朗修、馬拉美、卡夫卡、喬埃斯等文本裡看到書寫的物質性，語言文字表達的限制與可能產生的差異，社會歷史型構的主體條件，身體血肉的存在層次，這三個層次構築的文本超越語言符號的網路系統，(translinguistique) 目的不在溝通或說部份的溝通，旨在形變，將「我」推向語言文字的邊緣，以他者呈現。不是向某一特定對象說話，而是讓內在能量任其衝撞發洩移位(34)。以巴特的語言來說：將自己丟向不經意的邂逅，文字符號之外，意識之外，靈光乍現的偏航與墜落，如普魯斯特，或混亂堆疊一發不可收拾的氾濫滿溢，如薩德。

III. 回歸文本的閱讀路徑

沒有固定的框架統一文本的閱讀，文本以其顯性的結構隱性開放無邊無際的互文網絡，讀者只能縱深入林披荊斬棘，各自分出閱讀的迷宮路徑。我開始嘗試以單一作家文本閱讀建立理論脈絡，長期延續形成論述場域同時建立互文網絡。對教學研究而言，我認為回歸文本必須與了解理論與思潮論述同時並行。問題是：在差異與變異中如何統整出可供思想反省的座標？

梭萊思與克莉絲蒂娃最終仍回歸到黑格爾二元，企圖修正的是西方觀念下的理性傳統，對中國文化與中文的研究與興趣停留在去脈絡化的文字與思想之抽象邏輯，這當中的誤讀與印歐語言本位現象不可避免。然而本文重點不欲抓住這點討伐他們的誤讀，筆者自問對中文與中國思想的了解皮毛又何來能力匡正？而是中文邏輯在他們的解讀下到底如何協助開發了法國知識界在七十年代對現代性提出的觀點和闡釋。在我們移植西方現代精神形式技巧的過程裡，是否在根據本土現實環境與思維模式的限制下進行的詮釋與形變中(在現代主義文學的定義搜索)中，漏接了西方(如法國)語言文字「混中」異化的思索關鍵？關鍵在於吸收現代思潮科技與生活型態時，固有的象徵系統作為考量的參考質數如何發揮反斥的作用？所謂後結構已至於後現代的思潮移植到台灣後，值得深思的是：我們藉以辯證現代性的參考質數——所謂傳統或固有的象徵意義系統(中文思考模式與台灣特殊時空交相形成的主體)到底如何運作？

事實上，在台灣現代化及西化甚至美國化的發展過程下來，所謂孔子儒學、一神教與資本主義早已萬流匯聚、混淆難辨。所謂中國特殊的象形文字所對應的思考模式與亦在現代社會裡被排除遺忘，也因此有重估反省的迫切需要。教學經驗裡最大的困惑常是：不知如何在所謂後現代的世代裡讓學生掌握西方思潮真理(Verite)的重量、真實(reel)與現實(realite)的分別、所謂法規的限制(limite)與權力視界的標準 (norme)? 中國語言文字的重新認識是否有助於這些基本觀念的掌握？從而明瞭西方宗教語言與哲學觀念所衍生出來的論述邏輯？要強調的是，認識並非意指源頭的重溯或固定僵化之意識形態的認同，更遠遠不欲以此瓜葛民粹式的政治思想——而是借鏡他人思考的方法，找出我們特殊的歷史時空下影像、意義成型與變異的元素。跨領域結合語言學者、中文學者比較、反省，在萬流匯聚的語言、文化交流道上，分析一己之為主體的型塑過程與意義生產模式

-----或許是思索現代性另一個方向？

參考書目

- Forest, Philippe. *Histoire de Tel Quel* 1960-1982. Seuil, 1992.
- Hayman, David. *Writ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mi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Meschonnic, Henri. *Modernité Modernité*. Gallimard, 1988.
- Kristeva, Julia. *Des Chinoises. Des Femmes* 1974 (1^{er} ed.) ; Pauvert, 2001.
- . “Les chinoises à contre-courant”,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No. 592, août, 1974.
- . Polylogue. Seuil, 1977.
- . *Le langage, cet inconnu*. Paris: Seuil, 1969, 1981.
- . *Langue, discours, société pour Émile Benveniste*. Paris: Seuil, 1975.
- Sollers, Philippe. *L'écriture et l'expérience des limites*. Paris: Seuil, 1968.
- Tel quel*. No. 53, printemps, 1973.
- Tel quel*. No. 91, printemps, 1982.
- Tel quel*. No. 94, hiver, 1982.
- L'infini*. No. 79, Été 2002.
- Magazine littéraire*. No. 65, 1972.
- Critique*. 195-196, août-septembre, 1963.
- 彭仁郁譯，克莉絲蒂娃原著，《恐怖的力量》，台北：桂冠，2003。
- 羅 婷，《克里斯多娃》，台北：生智，2002。
- 于治中，正文性別意識形態 克麗絲特娃的解析符號學，呂政惠主編，《文學的後設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家》，台北：正中，1991。
- 何九盈，《漢字文化學》，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 刁晏斌，《初期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台北：洪葉文化，1999。
- 許逸之，《中文文法理論》，台北：台灣商務，1998。
- 常敬宇，《漢語詞彙與文化》，台北：文橋，2000。
- 張春榮，《修辭新思維》，台北：萬卷樓，2001。
- 藤堂明保，《中國語概論》，東京都：大修館，1974。
- 守屋宏則，《中國語文法の基礎》，東京都：東方書店，1995。
- 盧國屏編，《文化密碼 語言解碼：第九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